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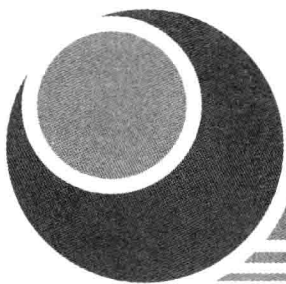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 何 丹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何丹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 何丹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1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ISBN 978-7-5472-1907-2

I. ①陶… II. ①何… III. ①陶行知(1891~1946)
-教育思想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541号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TAOXINGZHIDEJIAOYUSIXIANG

著/何丹

责任编辑/康迈伦

责任校对/李洁华

封面设计/李岩冰 董晓丽

印装/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170千字

印张/10.5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1907-2

定价/23.00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生平介绍 / 1

- 一、家庭背景及早年求学经历 / 1
- 二、赴美求学的经历 / 3
- 三、归国后的教育活动 / 5

第二部分 “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陶行知的教育改造思想 / 11

- 一、教育变革的重要性 / 12
- 二、教育变革中存在的问题 / 13
- 三、试验教育的实施策略 / 19
- 四、教育者的改革理念 / 23
- 五、考试制度的变革 / 26
- 六、大学教育的改革 / 28
- 七、重视女子教育 / 30
- 八、新教育的释义 / 31

第三部分 “一切以事为中心”——陶行知的学校管理思想 / 37

- 一、“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 37
- 二、陶行知的学校观 / 45
- 三、学校管理的原则 / 49
- 四、学生自治 / 59

第四部分 “培养生活力之创造”——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 / 69

-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理论概述 / 69
- 二、对创造的认识 / 70
- 三、创造的方法 / 77
- 四、培养创造力的条件 / 87
- 五、民主在创造力培养中的作用 / 89
- 六、创造教育的实现途径 / 92
- 七、创造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 97

第五部分 “行是知之始”——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 / 99

- 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基础 / 99
- 二、生活教育的特质 / 104
- 三、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 / 108

第六部分 陶行知的学校教育理论 / 131

- 一、活的教育 / 131
- 二、陶行知的教师观 / 139
- 三、全面发展的教育 / 152

第一部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生平介绍

一、家庭背景及早年求学经历

1892年11月16日，陶行知出生在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歙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新安江上游，地理位置优越，曾经是历史上徽州府所在地，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北宋时期，负有盛名的程朱理学在此诞生并且发扬光大。歙县同时还滋养了新安文化，是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敦派篆刻、徽派园林建筑等等优秀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儒家底蕴，孕育了众多的文人雅士。陶行知出生时，歙县依然保持着它浓郁的传统人文气息。

陶行知的原籍是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祖上系南朝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后代。陶行知原名陶文溶，是父亲为他取的，希冀他文采斐然、卓尔不群。大学时代，因受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思想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知行，后来在进行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认为“行而后知”，再次改名“行知”，从此一生未变。

陶行知出生前，父亲陶位朝在休宁县万安镇以经营“亨达观”酱园为生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势入侵，面向中国市场大肆倾销，而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对内却加紧盘剥，使得脆弱的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店铺纷纷倒闭。在这样的局势下，由于家族子弟的挥霍浪费，酱园难以为继，不得不关门停业，其父只得回家务农。母亲曹翠伪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劳动妇女，终日操持家务，还为人缝补浆洗，以贴补家用。双亲膝下原有两儿两女，但一男一女在幼年先后患病夭折。陶行知是在家庭极度艰难时期出生的。

在陶行知幼年时，考过秀才的陶父有足够的力量教他识字、习帖。陶行知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从父亲那里受益匪浅。六岁时，西乡瑶村村蒙童馆方庶咸秀才发现陶行知喜欢对着不认识的字临摹并且有模有样，灵气逼人，但因家贫无力给

付学费，就免费给他开蒙。九岁的时候，其父在休宁县万安镇谋得册书之职，管理当地的田赋档案，全家遂迁入万安镇。在外公、外婆的帮助下，陶行知得到当地的吴而宽经馆做伴读。十一岁时，家境日益衰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陶行知只好回家，但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始终坚持自学。自学期间，他慕名向品行文章在当地颇受敬重的前清贡生、私塾教师王藻老先生请教，有感于他的好学精神，老先生免费指导他的学习。虽然陶行知“正规”的经馆教育时断时续，但这种学习一直持续了九年有余。在这期间，陶行知一方面感受着生活的困苦和艰辛，接受到淳朴的乡友亲朋的无私帮助，使他最初萌生了朴素的对于贫苦民众同情与热爱的感情；一方面他勤奋学习，加上陶父用自己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悉心传授，为陶行知少年传统文化的掌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陶行知少年时代，外国教会势力逐渐渗透到他的家乡。其母通过友人的介绍进入歙县的一所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杂务。崇一学堂的校长是英国传教士唐进贤，唐进贤发现陶行知聪慧好学，就免费招他入读，自此，陶行知开始接受国文、英语、数理化等现代教育，并成为学堂中的佼佼者。在崇一学堂修习的两年中，陶行知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开始思考民族苦难、国家兴亡的有志青年，在他宿舍的墙壁上，清晰地写着这样几个字——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做贡献。

1907年末，陶行知以优异的成绩从崇一学堂毕业。1908年春，他投考广济医学堂志愿学医，并被顺利录取。一方面，选择学医，是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选择。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遭受欺凌，主要原因在于国人体质虚弱，于是把学医作为拯救民族危难的途径。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遭遇也直接诱发了陶行知的学医之志。他的姐姐和弟弟幼年生病未得救治而夭折，父亲吸食鸦片害垮了身体，这些对陶行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入校后，陶行知却发现，广济医学堂是一所教会学校，规定只有信仰基督教的学生才有参加两年医学实习的机会，非教徒学生则无此权利。这种不平等的规定使得陶行知在入学三天后就毅然退学。1909年，他到苏州投奔表兄张志暴，在当地浸理学堂读书，为维持生计，经常打一些短工，艰难度日。穷困潦倒之际，陶行知戏剧性地遇见崇一学堂的校长唐进贤，在他的帮助和推荐下，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博习馆预科。第二年，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改称金陵大学，陶行知遂直接升入金大文科学习班。

金陵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偏重英文，对中文甚为轻视。校刊《金陵光》只有英文版，而不出中文版。在陶行知等人的倡议下，学生们要求出版中

文版《金陵光》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压力，校方勉强同意只要找到合格的编辑人才就可以出版。陶行知具有深厚的国文功底，才华出众，在大家的推举下，他担负起了中文版校刊编辑的重任并陆续发表了多篇堪称石破天惊之作，彰显出他青年时期的爱国热情与救国抱负，以及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精神。在金大读书期间，他品学兼优，为人坦率正直、关心国事，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始终保持着奋发向上的精神，在同学中威信极高。

金陵大学当时有许多从日本学成归国任教的老师，他们都深受明治维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向青年学生传播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在日本倍受推崇、与欧美思想不分轩轾的情况，这在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学习“王学”的热潮。陶行知就是从这时开始认真研究阳明学说的，他深深为之倾倒，并把自己的名字由“文溶”改为“知行”，甚至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都是以王阳明的《传习录》为思想基础的。

因为出身微寒，陶行知对当时中国人民的贫苦生活才体会得分外深切；正是因为他自身的求学经历，陶行知对教育建国、教育造民的信念才会坚定不移。不能不说，自幼养成的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淳朴感情，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和教育，共同奠定了陶行知日后始终能够以亲民、爱民、为民、胞与为怀的精神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

二、赴美求学的经历

1911年，即陶行知进入金陵大学学习的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瓦解。此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成为影响先进知识分子思考强国之路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潮。这种影响使得陶行知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有关欧美政治、文化、历史方面的著作，内心逐渐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同时，庚子赔款也为陶行知选择出国留学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准备。当时的美国在中国境内兴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并对中华民国的文化政策制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08年，美方退还了义和团运动的部分赔款，中美两国协议决定，将其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从1909到1912年，每年派遣100名留美学生，从1913年到1929年，每年派遣50名留美学生，中方成立留美预备校，公费留学制度于是建立起来。另外，教会学校的特殊待遇为陶行知赴美求学提供了直接契机。当时就读教会学校的

学生只要能够支付保证金就可申请出国留学，于是从191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留学热潮。金陵大学就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具有把毕业生送往美国留学的资格。另一方面，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规定，凡属安徽籍的金大毕业生，如欲出国留学，均可获得官方奖学金资助。陶行知符合规定要求，得到了这笔资金。但是资金的数目有限，又通过向亲友借贷，终于凑齐了保证金。1914年秋天，陶行知终于踏上了赴美求学的征途。

陶行知最初计划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但由于没有参加中国政府的留美预备校，而是通过教会学校自费出国，所以他不能享受政府奖学金，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压力。而伊利诺伊大学所开设的政治学市政学专业可以为外国留学生免除学费并且提供奖学金，这迫使他不得不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学习。虽然更换了专业，但是陶行知学习教育学的志愿并没有改变，在伊利诺伊的第一学期，他就选择了教育行政学，1915年夏学期他选择了教育评价基础、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学讨论。

1915年，陶行知写信给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表达了他渴望进入该校学习教育的愿望。陶行知立志投身于教育，一方面是主观上感受中西方教育差异的结果，这种西学东渐的文化势差使他急切地渴望改变中国落后的教育状况；一方面是客观环境的影响，当时中国正是教育发生巨变的时期，正需要引领教育改革的大批人才，这为许多胸怀报国志向的学生创造了契机，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其他专业无处施展拳脚的社会条件下，纷纷投身教育改革，陶行知在当时的背景下感同身受，这也是他投身教育的原因之一；同时，在当时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正在掀起改革的热潮，它对于传统教育进行了开创性的批判，提出了很多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引发了全世界国家的注目，是吸引各国留学生学习的对象，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为他学习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提供了充分的条件。非常幸运，陶行知在这时恰好获得了政府派遣“半费生”资格，可以领取“利文斯顿”奖学金，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于是，1915年9月，在取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陶行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去学习他梦寐以求的教育学。

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初名皇家学院，1784年更名为哥伦比亚学院，1912年改称哥伦比亚大学至今。该校师范学院前身为纽约州立师范学校，于1898年并入哥大。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教育改革的蓬勃兴起，哥大师范学院成为这一改革浪潮中的领军者，遂步入其早期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师范学院可谓大师云集，如院长是著名学者罗素，研究院院长是教育史和比较教育

学家孟禄，教育学系主任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杜威。此外，教育心理学家桑戴克、教育哲学家杜威的高足克伯屈、教育社会学家斯列丁及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等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也都汇聚于此。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不断探索创新，共同掀起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这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俨然成为当时一个现代教育圣地。^[1]陶行知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哥大学习的，跟随斯特雷耶教授攻读教育行政。与他几乎同时转入哥大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界领袖人物的胡适，跟随杜威学习哲学。

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之初指导教师是斯特雷耶教授，但陶行知对杜威与克伯屈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孟禄的教育史学以及斯列丁的教育社会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因为陶行知的勤奋努力，杜威、孟禄、克伯屈等都很赏识这个中国学生，给了他很多指点和帮助。在这些教育大师的悉心教导下，陶行知系统学习了有关教育学的先进知识，且深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浸染，这为其日后的教育活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哥大的两年，正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界，尤其是哲学方面声望最高的时候。杜威那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哥伦比亚大学的进步教育思想，特别是杜威的“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课程观念对陶行知产生了深刻影响。

虽然海外求学时期获得的西方教育经验与学术思想尚未完成本土转化，但是必须承认，陶行知赴美留学三年的勤奋刻苦与耳濡目染，对于他完成自身知识体系中有关西学的博采众长以及日后形成扎根民族土壤中的教育理论有极大的帮助。

三、归国后的教育活动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的第二学期，正值国内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扩建发展成为国立综合性大学之际。负责人郭秉文早年也曾留美学习教育，恰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成为该院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为筹备建校事宜，扩充师资，郭秉文亲自到哥伦比亚大学招募人才。陶行知本就有归国投身民族教育事业的迫切愿望，与郭氏会晤后，这一愿望更为强烈，在完成博士论文申请并通过口试后立即回国，成为扩建后的东南大学教育学教员，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并于第二年升任教育专修科主

[1] 周洪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现代中国教育,教育评论(1).2001年第5期,57页.

任教员及代理教务主任。1919年10月，因郭秉文擢升校长之职，陶行知正式成为国立东南大学教务主任，随即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陶行知的改革是以适应实际需要为原则来进行的，许多措施在当时是开创中国教育史上先河的壮举。一是采用科学方法编制课程表，统筹安排，既使所有教室得到充分利用，又可适应临时调课的需要。二是允许男女同校。这一措施与蔡元培的公开谈话遥相呼应。北大于1920年初率先开创男女同校的先例。同年秋天，东南大学教育学院招收女生入学。三是开办暑期班，为社会各界有学习愿望的人服务。1918年受江苏省教育厅委托，高师为该省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县级视学，开创了高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先河。四是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教授法忽视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开发。先是苏州师范学校采纳了这一主张，随后，全国其他大中院校也相继改革，这一叫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五是鼓励学生自治，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五四前后的陶行知一直积极传播杜威的思想学说。1918年，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成立，陶行知担任专修科主任，大胆推行课程改革。首先改革的是该科附属小学，他把课程分为选修和必修两类，实行学分制，教学方法采用“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成立课外活动班，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并在班级设立学生自治委员会，用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独立性。对小学的改革可以说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首次应用试验。高师的课程改革首先从丰富学科设置开始，《遗传学》、《生物学》、《实验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在当时是前沿学科，陶行知将其加入到教育学课程学习中。此外，教育专修科还聘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统计学及心理学教授麦克尔讲授《测验的编制及应用》，这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最先进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陈鹤琴、俞子夷等知名教授辅助教学，全国其他师范院校的教师纷纷前来听课，极大地提高了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的地位。此外，专修科不断上马集体科研项目，如制订课程标准、修订教材、编制心理测验等。

1921年，中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是讨论制订新学制。陶行知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代表全程参与了新学制的起草和制订。有关新学制的态度他立场鲜明，认为首先要适合国情，不可全盘照抄国外的学校系统设置。他批判国内兴学以来的学制“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1]。因此，他主张：“我们应用科学

[1] 陶行知：《我们对于新草案应持之态度》，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91.

的方法态度，考察社会个人之需要能力和各种生活事业必不可少之基础，修正出一个适用之学制。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它；如不适用的，就回避它；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它；如不适用，就除掉它。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1]

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暨南学校、江苏教育学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组成的“中华新教育改进社”。1921年，新教育改进社与《新教育》杂志社和教育调查社合组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杜威、孟禄为名誉董事，蔡元培、郭秉文等为董事，陶行知担任主任干事，具体负责一切社务，并于1922年夏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专心改进社事务。

为全面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与朱经农编写了《平民千字课》，编成后，陶行知请自己的妹妹和顾克彬、扬中明等在各地试教来检验教材，效果喜人。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千字课》，很快售罄，由此可见，这本教材受欢迎的程度。《平民千字课》销量巨大，稿酬自然丰厚，但陶行知分文未取。姚采文先生回忆，商务印书馆曾送1万元版税给陶行知，陶行知的妹妹文淡女士因为家用不足，和哥哥商量留下2500元。陶行知却说：“妹妹，你脑筋就缺这四分之一啊！如果加上这四分之一，不是更美好吗？”最后说服妹妹把全部酬劳都献给了平民教育事业。平民教育运动是陶行知对杜威实用主义继承创新的全新尝试，也是他胞与为怀之精神的生动体现。

此后，在1925年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陶行知把他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三次考察成果作为中心议题。会议一结束，他立即筹备建立乡村试验学校，争取早日“到农村去”。

从国内艰苦求学，到国外接受进步思想浸染，再到确立个人教育事业，是陶行知由杜威思想的翻版到逐渐摆脱照搬照抄思维模式的发展过程。陶行知回国走上事业舞台后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尝试，虽然遭遇了许多保守势力的阻挠，但他坚持把西方教育理论运用到本土实践中，革故鼎新，并日益适应当时中国85%的同胞在乡村的现实，显示了他的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改革勇气。为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陶行知长年累月在外奔波忙碌，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对家人更是很少顾及，甚至于过年都没有时间回家团聚。“东西南北路，一月一万里”、“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等诗句都是他辛苦奔波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因为他对教

[1] 陶行知：《在〈学制系统草案〉讨论会上的发言》，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70。

育事业的投入、执着，才有后来中国教育史上的经典教育园地——晓庄师范。

1926年底，陶行知将教育实践转向农民，对南京、无锡等地进行考察，开始筹划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同期拟定《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对学校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院务安排、招生毕业与考试以及修业年限、费用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1926年12月31日，陶行知收到江苏省教育厅准许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的复函。1927年2月，他在老山小庄选定校址，将其更名为“劳山晓庄”，“劳”指“活”的教育，在“劳力上劳心”；“晓”意喻“黑暗中的黎明”。此后，陶行知相继制订了通过董事会商议的形式，分别对学校组织、招生条件和董事会、会计以及计划预算的要求做了系统的阐述。晓庄师范学校在办学宗旨上，招收初中、高中、大学末年级生（最好具有农事或土木经验）加以特殊训练，使他们能够实施乡村教育并改造乡村生活。同时号召有志于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农民自治力的在职教师投考。希望从乡村教育入手，寻找改造中国教育和社会出路，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兴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陶行知以“自由办学”思想创建的晓庄师范学校，在度过三载春秋且本有继续发展壮大之趋势的情况下，终究不为当局所容。事情的直接起因是，“四·三”惨案发生后，晓庄学生与南京各校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工人罢工，抗议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工人，最终迫使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接受复工条件，取得了示威游行的胜利。然而，这一爱国行动却刺激了蒋介石，他公开威胁要制裁晓庄。与此同时，陶行知始终坚持学生无错，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爱国的、正义的。这一秉持原则的态度再次惹恼了蒋介石，1930年4月8日，他密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封闭晓庄，陶行知也被通缉了。虽然，晓庄这块“自由之园”被当局勒令停办了，但晓庄精神的种子却在各地生根发芽，陶行知生活课程理论的继承人在各处传播着他的思想，践行他的理念。晓庄的校友陈宏韬曾不无自豪地说：“晓庄，学生没有毕业的期限，也不发毕业证书。同学们离开母校走上工作岗位，如果工作的单位需要缴验证件，学校也会同意发给学历证书。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很少有的。因为那时的晓庄，已在国内颇负盛名了。每到寒暑假，全国各省、市、县的教育单位，邀请晓庄同学前去服务的函电，好似雪片纷纷飞来。只见事来找人，没有人去找事。”^[1]

1931年春陶行知回国，从事科学普及教育，开展“科学下嫁”活动，编辑了

[1] 陈宏韬：《忆晓庄念陶师》，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评传[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165。

许多科普读物，1932年在上海郊区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力图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以达到普及教育。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800余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2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他被选为理事长，开展国难教育运动。7月初，全国各界救国会决定委托陶行知趁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之便，前往欧美亚非等28国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并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会议。8月底到9月初，陶行知赴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青年大会。9月，参加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陶行知被推举为中国代表团主席和中国执行委员。1938年夏回国，陶行知被选为国民参政员，积极呼吁战时教育。12月，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理事长。

1938年，出访26国宣讲中国抗日主张的陶行知返抵香港，发布了归国三愿，其中一愿就是开办一所难童学校，培养人才幼苗。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国家处于极度的战乱与动荡之中。全国各地布满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这些在战争时期丧失了受教育机会的孩子，不乏许多有特殊才能的人。在抗日和建国过程中急需人才的时期，这些儿童得不到及时的培养，将是一个沉重的代价。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召开了原晓庄学院董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育才学校，专门致力于培养难童中的人才。会议还通过了育才学校的办学章程和计划书，将原来的晓庄学院董事会改为育才学校董事会。在抗战时期，重庆的北碚地区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区，陶行知将育才学校校址选在距北碚三十里外的草街子镇凤凰山。

1939年7月，育才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至正式上课有学生71人，到1940年5月，全校学生有168人，分为戏剧、音乐、绘画、文学、社会、自然六个专科学习组，它是抗战后的一间新设立的学校，它的宗旨是培养聪颖优秀的难童，给予以基础和特科的教育，让他们成为现在抗战的小力量及未来建国的专门人才。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学生发展到近400人。

1945年，陶行知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任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他积极投身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积极倡导民主教育。

1946年1月，他与李公朴、史良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其目的是使广大的失学青年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倡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和技术教育并举。4月，他离开重庆到上海大办教育事业。6月23日，在上海北站十万群众欢送赴京请愿代表大会上，担任大会主席，陶行知发表著名演说，要求和平，反对内战。7月，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害。陶行知说，“我等着第二枪”。12日，在沪江大学做最后一次讲演：《新中国之教育》。21日，写下了最后一首诗《祭邹韬奋先生文》。他面对敌人威胁，无私无畏，视死如归。在上海最后两个月里做了百余次演讲，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反内战、反独裁、要民主、要和平的意志。7月24日，他至友人处，与之畅谈时局，接着连夜整理历年诗稿。翌日(25日)凌晨，终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致脑溢血，不幸溘然长逝，终年55岁。

陶行知一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主要有：平民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论、乡村师范教育思想、普及教育思想、创造教育思想、民主教育理论等主要理论体系，由此可知江泽民同志说的“陶行知先生著述宏富，论述精当”的确切含义。

陶行知先生一生的教育著作和教育思想丰富而浩瀚，他的教育代表作有《中国教育改造》、《教学做合一讨论集》、《普及教育》、《中国大众教育问题》、《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及其方案》、《怎样做小先生》、《育才学校手册》、《行知教育文选》、《陶行知论普及教育》、《陶行知论乡村教育改造》、《陶行知论师范教育》等，经后人整理主要收集在《陶行知全集》(8卷本，湘版)、《陶行知全集》(12卷本，川版)、《陶行知教育论著选》、《陶行知教育文选》里。

第二部分

“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

——陶行知的教育改造思想

1914年陶行知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求学期间，由于陶行知的勤奋好学，故此深受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任课教师的器重。其中，对陶行知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杜威。

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杜威是20世纪上半叶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一向被人们看作“美国进步教育运动及20世纪前半期教育革新的杰出思想家”。由于他站在哲学、社会学的高度来思考教育问题的无人可比性，使得他的理论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指导意义。作为杜威的学生，毫无疑问，杜威的教育思想对陶行知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考察杜威与陶行知之间教育思想理论的传承，其中最明显、最突出的部分之一，就是表现在教育的革新精神上。“反传统”是杜威教育思想理论的主要特色之一。同样，这种“反传统”也是陶行知用作建立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原则之一。

留学时期乃至归国直到五四前后的陶行知，把杜威的思想作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圣经，在思想上完全继承实用主义的理论并深信不疑。陶行知在后来回忆自己与杜威思想的继承关系时，曾经坦率地承认，回国之初的教育实践是全盘照搬实用主义教育经验的。1918年，中国教育界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陶行知几次致函胡适商量接待事宜，并在报刊杂志撰文介绍杜威生平学说，一时间掀起国内学习杜威教育思想的热潮。在他看来，“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有密切关系”。足见这时的陶行知是杜威思想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把中国教育改革的前途与杜威学说紧密联系，对杜氏寄予厚望。因此，在陶行知早期的教育活动中，介绍、传播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其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20世纪早期人们对教育研究和教育学术的兴趣日益浓厚。首先，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公立学校的迅速发展使教育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并

导致了对教育理论的探究和对教育实践的关注。杜威等倡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其次，19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公立和私立大学及其他高级研究组织机构的建立，为教育研究提供了阵地。再次，对教育问题的探索是美国人的科学探索精神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教育科学运动”的开展。20世纪早期，“教育科学运动”开始形成。其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桑代克，他的工作具有心理学和统计学基础，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客观研究的，人的本质的客观性使得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可以成为数量化科学。

陶行知从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引起的教育实验中吸收了诸多经验。他凭借自己的敏锐观察力和对先进方法的敏感性，通过在美国新型学校里的教育实习，获得了诸多不同于中国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成为他回国任教早期开展教育改革的直接参照，并在中国大力推广。他在美国观察到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都有教育试验基地，这使他归国后极力推行试验主义这场运动。

陶行知的可贵，在于他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富于理论创造的热情。他没有仅仅停留在简单地介绍或应用西方的教育理论上。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必须寻找一条生路，他从对传统旧教育进行批判和破除入手，不断改变教育观念，不断探索新的教育问题，孜孜不倦地寻找适合于中国实际的教育之路。

陶行知留学回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比较注重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来思考现实教育问题。他撰写了关于介绍西方教育改革思想及方法的《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试验教育的实施》等文章。然而，他没有仅仅停留在介绍和应用当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上，他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了《思想的母亲》、《教育研究法》、《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教育与科学方法》、《教育改进》、《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新教育》等关于改革教育的文章。

一、教育变革的重要性

20世纪初，是中国各种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各种教育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陶行知首先在《教育与科学方法》中强调了教育变革的重要性：

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